文明真空与未来中国潜在的危机

芦笛

说是发愤著书，弄了两天又吃勿消了，几欲身心崩溃，忧郁症又有发作危险，所以还是来网上扯淡说屁话散散心。

我 enjoy 写文章，但痛恨脑力苦役，所谓 intellectual drudgery 。就拿眼下正在写的《野蛮的俄罗斯》来说吧。若是写网文，写作只会给我带来极大欢乐，那不是说我可以信口胡柴——我在网上推出的史论，可谓“无一字无出处”，那都是我多年阅读积累，在写作过程中还不断去查有关的参考书。但若要出书，我就得从事“文人装逼活动”，一一给出资料来源，盖那就是他们衡量“学术价值”的唯一标准。尤其这种必然引起毛左暴跳的敏感书籍，那更是必须处处预防他们“芦笛造谣”的诬蔑。新近贴出的《红色恐怖》就是个范例，每段话都有脚注，有许多直接来自俄国人自己抛出来的档案材料。

所以，我之所谓“整理书稿”，其实就是从头看一遍旧稿，苦苦回想我哪段话是从哪本书上引下来的。盖我那文字最初不过是老加的一个烂帖触发的，从未想过要写成长文，遑论是一本将近 30 万字的书，结果一下笔就来劲了，厚积薄发，不可遏止。既然是自动生长，当然就懒得效法文人装逼，去 bother 什么参考书目。但贴出后反响很大，于是便在写了 3/5 时动念改为一本书，这才停下来去追补参考书目。得，那就意味着重复劳动：先把家里那些参考书一一看过来，落实哪段话在哪儿。英文书字母很小，我没配老花镜，裸眼看着实在吃力，又是瘫痪在床，找到那页后，第一件事便是想法把书固定在床上，然后歪着身子扭着头把那段话打下来，有的材料来自网上，可我当初没把网址记下来，直接便译为中文。到后来要找出处，这就麻烦了。我只好把中文再翻为英文，用谷歌搜索，常常要多次变换关键词才能找到原来那网页。例如列宁就镇压舒雅的僧侣们一事发给莫洛托夫的信，让我足足找了一天才在网上找到。真 TMD 晦气，唉。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也是这么触发的，原来也没有写成书的念头，也没注意记录资料来源，所以要整理成书，还得吃大苦耐大劳，唉，真怕。

所以，老芦需要的是研究生。等我出满十本书后，便去名校申请个教授位置，再招上两三个研究生来作牛马走。I have a dream~~~~

这些当然是屁话兼梦话，还是来说正题吧。

窃以为，老金最近贴出的大作，大约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当然，这么大的话题，难免有考虑不成熟或粗疏之处，何况他还是一心二用，在带研究生、申请经费、填表格、预防研究生自杀、寻思是否要给新来的没送礼的研究生发小鞋之余，见缝插针地来这儿奉献，还要时时穿插上回答网友质疑的文字，读起来难免文气不畅。但这些都是小事，会看文章的人绝不会买椟还珠。白吃文人如寒江月辈或理科浑人如赛昆辈，便到死那天也没那智力学会怎么看文章。其实我已经反复讲过了：一篇文字的所谓“学术价值”，其实是它的思想价值，而这思想价值既不在于开出了多少参考文献，也不在于结论是否成立，

甚至也不在思路是否无懈可击，而是在它是否 intellectually provocative，能启发别人去想从未想过的重大问题。论思路，马悲鸣可谓千疮百孔，然而他的网络存在仍有价值，那就是他的怪脑能刺激训练有素的高手去想过去忽略了的问题。而这是智力难民营全体难民加在一起也做不到的。

这就是我为何那天暴怒如狂，要浪费时间去臭骂那蠢到漫了边的无知蠢妪。不过人生蠢了也不是她的错，是基因的错，对此类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的毛共贱族，我辈应该怀有一种真正的精神贵族的悲悯情怀才是。

还是说正题吧。老金那大作，触发我想到了起码十个问题，都是原来没想过或是朦胧想到但不是那么清晰的。如果要把这些问题一一写出来，那我就别想发愤著书了。现在《野蛮的俄罗斯》就只差一章和一节便可杀青。我若是在网上耽误久了，看过的资料又要淡忘了，这不是说忘记了基本事实，而是又找不到典从何出了。所以还是只能以提纲方式简明扼要地说一下。

先开出最主要的问题来，再逐点扼要给出我的想法。

1）文明是什么？与文化有何区别？生活方式，价值观等等，算是文化还是文明？

2）不同文明是否有优劣之分？彼此是否有竞争以及淘汰现象？如果有，能否运用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的基本原理？

3）不同文明是趋同还是趋异？如果是趋同，是强大的先进的文明吞噬了弱小落后的文明，还是熬成一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杂烩？所谓"强大""先进"云云，到底如何判定？

4）如果一个落后国家全面引入了强大的先进的文明，取代了旧有的弱小落后的原生文明，那到底是是福还是祸？"强大"是否就是"最适者"？

5）现代中华文明区别于西方文明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在未来是否会全盘西化？美国生活方式能是中国的最适生活方式么？

一、文明的内容与显隐

如所周知，现代西方学者倾向于用"文明冲突说"来解释历史甚至预言未来。最著名者当数亨廷顿的《第三波》，记得那是 80 年代最热门的书籍之一。但早在 70 年代初的地下读书运动中，我看了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便已熟知这套路了。老费也是用文明冲击来解释中国近现代史的，那震撼之大，给我留下了终身影响。在那之前，我熟知的只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从未见过用文明互动来解释历史的全新思路，这也算是西洋文明对我这个中国伪文人（不是文人，远胜文人）的一大冲击吧。

正因为已经有过这种理性经验，我才没觉得亨廷顿那破书有什么稀罕的。事实上，他作的预言业已破产，或至少被严重质疑。但我若不上网，便打死我也想不到世上竟然会有寒江月那种只配坐肉蒲团悟道的蠢货（SH？尚待老加前去考证），连亨廷顿那本书都从未

听说过，这才会悍勇绝伦地出来宣布“中华文明是个伪概念，根本不存在”，还敢觍颜自称是文科学者，连累普天下广大文科学者和她一起丢脸。既然如此，哪里还有什么中西文明冲突？鬼子只需浩浩荡荡开进无人区来便是，岂还会有义和团用祖传精神文明结晶硬气功，去跟代表鬼子物质文明的马克辛重机枪冲突的怪事？

但这些学者使用这个概念之前都从未界定，至少我本人不记得他们这么做过。这种概念，似乎成了亚里士多德所谓“范畴”，也就是外延最大的概念，因而无法给出定义来。但细想似乎又不是这么回事。我可不比老金博学多识，擅长的是思而不学则殆，但想了半天仍然无法给出个标准逻辑定义来，只能囫囵说说朴素感觉。

所谓“文明”，就是某个地域内的居民一切智力活动成果的总合，它包括宗教、文化艺术、科学、学术（指科学以外的学科）、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道德伦理与其他价值观、mentality（心态？），等等。

根据其表现与生存力，文明可分为两大部类：显性文明与隐性文明，前者属于精英，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同义，也就是写成书本的各种学说，包括宗教、文化艺术、哲学、科学、人文学科和其他由台湾芋仔和番薯们译为“意缔牢结”（ideology，大陆译为“意识形态”）的东西，而后者属于草根，类似所谓“不成文法”，不是写下来的东西，主要表现为人民的心态（mentality）、反应定式、思维特征、潜在的价值信念、行为规范，等等。

这两类文明中，前者最容易看见，因而也时时是学者讨论的热点。老金那系列似乎就只谈了看得见的儒家文化，但在我看来，其实后者虽然看不见，或是不容易那么看见，但作用更大，生命力更旺盛。

在过往一个半世纪中，儒家文化已被彻底淘汰，荡然无存，彻底失传。今日中国无一人懂此道（maybe 老芦可勉强算懂 3/10-7/10 的人），要知道这一事实，看看文盲于丹、蒋庆辈的垃圾文字足矣。如今学校里开设的所有科目，无一门与传统文明有关，即使是中文，也是经过西式改造的杂种，绝大部份词汇反映的概念都是洋货，句法、语法都是模仿西货制定的；历史也是用西洋方式整理、研究、解释、传授的；艺术也类此，小说诗歌戏剧雕塑美术等等，一律使用西式技法。凡是纯国货都无生机，格律诗便是榜样。

这毫不足奇，我早在旧作中指出过，西学东渐前，中国人从未有过严格意义上的认识活动，无学术可言。就连冯友兰那国际知名的新儒家都不能不承认，中国有哲学史，学者知道该怎么做学问，始于胡适从美国奥林比亚山上偷来了天火（《冯友兰自述》，载《新浪读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华夏文明倒真是个“伪概念”，因是无人区，鬼子自然能浩浩荡荡开进来顺利占领，不曾遇到任何象样抵抗。

如今尚存的所谓“华夏文明”，其实是隐性文明，也就是千百年为儒道释模塑出来的人民的心态（mentality）、反应定式、思维特征、潜在的价值信念、行为规范等等，就是它构成了文明冲突的主体。

如所周知，中国对入侵西洋文明的抵抗，从未表现为文化大论战，亦即以国学去痛批西学，或至少是指出西学的窳陋、粗放、缠夹不清之处（如老芦用西学去刻薄国学一般，

除了用九阴白骨爪将《老子》、《孙子兵法》等经典戳得千疮百孔外，还公然写出《我为苏东坡改文章》，就贴在东海一枭的论坛里，他还不是只能默默忍辱），而只能由士绅利用愚民早就给模塑好的心态、行为规范与反应定式，把他们煽动起来，掀起轰轰烈烈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火烧十三行；义和神拳扶清灭洋，"扒飞车，搞机枪（"巴"之误？），撞火车，炸桥梁"（红色经典《铁道游击队》插曲），砍倒电报杆，火烧洋教堂，痛杀二毛子……。总而言之，正因为咱们的显性文明上不得台盘，无法摆出堂堂阵势来大破连环马，所以只好"礼失求诸野"，"民心可用"，靠暴民的拳头去代替学者们的脑袋。

因此，"新儒家"们咬牙切齿，痛恨毛共彻底毁了中国文化，虽然不是毫无根据，但未免张大其词。敝乡有句俗话："烂泥糊不上壁。"台湾没搞毛共那套，先总统蒋公还百计弘扬国学，不但专门针对咱们的文化大革命搞什么"文化复兴运动"，还把国学当成类似大陆政治课，让小学生回答："拒绝吸食安非他命（或其他毒品，记不得了），到底是以下哪一种：1）礼；2）义；3）廉；4）耻？（NND，我想了半小时也没想出正确答案来，就连"廉"都无法排除）请问他们现在还有多少国货留下来？又有几个台湾年轻人，对国学经典的熟悉比得上对日本动漫的熟悉？海峡两岸的人的心态、行为规范与反应定式，等等，到底是相同点多，还是相异点多？为何彻底毁灭中国文化的毛共没能去除那相同点？

举个最近的例子来说吧，富士康的 12 跳，为何不会发生在欧美在中国开的工厂里？台湾人欺负外籍劳工，把他们视为低人一等的生物，老板的虐待可以远远胜过共干，早已臭名远扬，遐迩皆知。90 年代有群福建船员实在受不了船长的虐待，奋起抗暴，用极度残暴的手段杀死了船长，当时轰动了台湾全岛（这可是《中央被日报•国际版》报导的哦）。可这种事就是断不了根。几年前，泰国劳工不堪台湾雇主虐待，又在台湾大规模暴动，再度轰动全岛。这种事为何不会发生在欧美？我一位朋友是商界高级职员，在台湾大班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认为那是她一生最痛苦的经验，跟在美国老板手下工作完全两样。

台湾人甚至歧视到越南菲律宾等国去的所谓"外籍新娘"头上去，好像人家有什么不干净之处，类似印度"不可接触的贱民"。而同样是外籍新娘，若是娶的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毛子（那毛可以多到摸不到皮肤，如同动物的 fur 一样，更不必说中人立死的腋臭了，只有丧失了嗅觉的老加，才不需要防毒面具），则立马便成了《天仙配》，只合高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随手摘下花一朵，我与娘子戴发间。从今再不受那奴役苦，夫妻双双把家还。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这是一位 70 后台湾人在《我们台湾这些年》中坦率承认的。这种心态与反应定式，难道不是大陆人的标准心态与行为？

早说过许多次：偶然的历史原因造成海峡两岸的分裂，为社会学家提供了再理想不过的对照实验。从这个实验中不难看出，无论是否政府动用暴力摧毁，两岸传承的显性华夏文明都荡然无存了，留下来的只有隐性文明，正是郭老才子的《满江红》所说："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所谓冰山，就是显性文明，而真金则是隐性文明。在我看来，所谓东西文明的区别，就是两家隐性文明的区别。所谓文明的冲突，也就是两个隐性文明的冲突。

凡是海外赤佬，似乎都该知道这点。到西方后最大的冲击，不是什么人家科学发达，国

家富裕，物质享受一流，人民个个文化教养深厚，才智超群，而是别的东西。和中国学者比起来，大部份鬼佬都非常无知，起码在 80 年代以前如此，盖他们是看电视长大的，而我辈是看书长大的。我在旧作中介绍过，我认识的一位英国姑娘连高尔斯华绥是谁都从未听到过，一位法国姑娘不知道拿破仑第三与第一的关系，甚至不知道拿破仑第三的存在，硬要跟我说《包法利夫人》是司汤达写的，还死不服输，最后还是靠上网去查解决争论（那时网络问世还不久）。后来遇到的两位法国博士生更无知，其中一位姑娘不知道法国国歌是什么，当我忍不住表示震惊时，她还傲然地说：我为什么要知道？知道了有什么用处？另一位姑娘虽然知道是《马赛曲》，也会哼哼两句旋律（还哼不全），却说不出歌词来。

然而这些相当无知的鬼佬们与我辈有个本质不同：心怀坦白，光明磊落，诚实忠厚，气度恢弘，富于爱心（当然这些品德只是相对国人而言，鬼子并非天使，坏人多的是），常常表现出国人无法理解的无缘无故的爱，基本见不到国人中常有的无缘无故的恨，更见不到阴暗猜疑、疑神疑鬼等国人最引为自豪的大智慧。我孩子刚出国时 12 岁，英语一窍不通，但就连他处在黑洞中时也能察觉这点，对我说：这儿的人好处，心眼大，不容易得罪，不随便记仇，云云。

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好像人家也没像大陆那样由政府开设政治课，到处张贴“五讲四美三热爱”，也没像台湾人用“礼义廉耻”作选择填空，该怎么做人的教导也不见于他们的教科书（起码中学以上的教科书没这些内容，我孩子是在国外上的中学，对这点我有相当把握，大学就更不必说了），似乎也与宗教无关。盖欧洲与美国不同，宗教已经基本“老兵不会死，他只会淡出”了。在我认识的鬼佬中，信教与否对人品似无显著影响（当然样本太小，不足以构成统计意义）。

因此，这种心态、反应定式、行为规范等等，不是文字教育的结果，而是千百年来的生存环境潜移默化使然。这就是看不见的隐性文明，它构成了最强大的文化传统，但去书上找是找不到的。

这种隐性文明是怎么形成的？我不同意老金的唯物史观，就算那能解释俄国人与中国人的区别，仍然无法解释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区别。两者都是农耕文明，都信奉集体主义，都没有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传统，但中式与日式集体主义完全不同，我已经在旧作中讲过了，不拟在此重复，只想补充三点：日本人不兴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日本人悍勇绝伦，宁死不屈，恰与中国人的贪生怕死程度相当；日本人虽无原创能力，但学习能力一流，恰与中国人缺乏学习能力的程度相当。两国的显性文明都差不多，无非都是儒道释，是这些民族心态、性格反映出来的隐性文明，而不是圣贤经典，更不是生产方式，构成了两国最大的区别。

我在旧作中说过，文明的形成是个多元函数，影响它形成的因素很多，绝不止经济基础一个，而是包括地理，气候，自然环境，人口密度，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等各方面因素，甚至有许多无从预测、无法 generalize 的偶然因素。决定历史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除了历史人物的主观作用和其他偶然因素外，最重要的还是文化传统。当一种文化传统因为适合社会需要而被筛选出来，通过长期磨合，弥散到草根，形成隐性文明，熔铸出一种全民最适的生活方式之后，它就很难更改了。若是遇到外来生活方式的强烈冲击，该民族便会逸出运行千百年的轨道，失去了最适生活方式，因而引出无穷的社会动荡，

跟剥了壳的乌龟一样，在沙滩上痛苦地辗转翻滚，直至滚平半亩沙滩，而这痛苦便是隐性文明与外来观念捍格难入引起的。

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俄在内，都是处于这种剥壳（博客？）状态。要改变这种状态，绝不是“制度决定论”者想象的那么简单，只需来个暴力或非暴力的革命，模仿西方建起新的制度来即可。民国实验与俄罗斯实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道理不难明白：前面已经说过，隐性文明惯性极大，即使用暴力都难得摧毁，岂能指望靠建立一个新制度便能把那页翻过去？而没有与之相匹配的隐性文明作基础（不是经济基础，而是文化基础，这就是我和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分歧），要建立一种新制度只能貌似而实非，挂羊头卖狗肉。

隐性文明的涵义还不止此。老金已经解释过，究其实质，儒家乃是“人事关系学”，关注的重点是通过理顺人际关系来建立和谐社会。儒家的理想社会与物质繁荣无关，只有一个指标：是否和谐，其手段则是建立一种“善良的等级制度”，其要义是把家族关系放大到全社会规模，将权力道德化（易中天语），造成一种权力与道德相结合的社会等级制度，实行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毫无权利可言，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平等观念以及“机会均等，费厄泼赖“。但这种等级制度标榜的是道德，亦即社会上的上等人也该是道德上的上等人。通过这种粗陋的社会设计，孔孟指望靠上级的单向施恩。去消弭剥夺下属权利必然造出的社会弊病，其具体操作原则便是后世补充的《朱柏庐治家格言》，为老芦终生信受奉行。

这就是儒家为何要在宣扬绝对服从的奴才哲学同时，也要强调仁爱（“仁爱”其实是对上级［君王、父亲、丈夫］的要求，下级并无仁爱的资格，下级的美德是忠、孝、节，平级则是义），强调“中庸”（也是对上级的要求），也就是不要走极端，以免引起严重恶果。两者的设计目的都是“缓和阶级斗争”，指望用上级的单向施恩，去抵消他们予取予求必然引来的下级怨恨。

因此，在儒家经典里绝对看不到仇恨宣传，更没有邪恶计谋的教唆，盖这两者都与旨在缔造和谐社会的圣贤之道格格不入。就算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浓重的家族气息，它毕竟没有教唆你去和别的家族打冤家，械斗仇杀，更没有教唆你如台湾人或大陆人那样势利，去欺负进城的乡巴佬，逼得逆来顺受惯了的福建农民都忍无可忍，杀死船主还不解恨，还要将其碎尸万段。

然而如所周知，国人中最常见的就是无缘无故的仇恨与酣畅淋漓的窝里斗，这可完全违背了祖师爷的意思。这可不是毛共造的孽，毛只是将这背时传统发扬光大到了最高最活的顶峰罢了。他代表的其实是国人心目中大智慧的顶峰，那就是与建设毫不相干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把整人、控制人发展为一种空前绝后的艺术。

但这艺术并非他首创，而是隐性文明的久远积淀。从《国语》中的《司马错论伐蜀》，到法家特别是韩非子兜售的那些让人不寒而栗的整人手段，到《三国演义》中诸葛军师无穷无尽的妙计，一直到易中天《品三国》以及“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中对种种“利益博弈”高招的深文周纳的钩沉显隐，过往两千年的文明中隐藏着一条从未间断、代代推陈出新、于今尤烈的“灰线”。

我之所以不称它为“红线”（这其实是英文成语，red thread，只是许多国人不知而已），乃是它从未如孔孟之道一般被官家表彰提倡过，但它不但从来是辅佐主流文化不可或缺的革命的另一手（看看朝廷重大政策辩论即可知道这一点），而且比显性文化更有生命力与感召力。《三国演义》、《水浒传》成了历万世而不朽的游民经典，至今非但未被淘汰，还成了名家呕心沥血去阐发其中的无数阴谋诡计的攻关课题，以最大限度地败坏国民心术（我为易中天惋惜的就只有这点，卿本佳人，缘何做贼？要是不写那什么鸟的《品三国》，钱当然少了不少，但身后名声恐怕要好得多），似乎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当然，隐性文明也未必都是“师爷心术＋痞子手段”，也有好东西。老金注意到，在传统社会，一般而言，社会下层的道德水准要高于上层。但他没有指出原因。其实这就是靠草根隐性文明使然。儒学不过是一种空想主义，其基本假设是“人皆可以为尧舜”，亦即人性是可以无限改造的，这只反映了圣贤对真实人性的认识彻底阙如，我已在《试论孔孟之道对人性认识的偏离及其流弊》中阐述过了。因此，它要成为全民奉行的显性文明，根本就缺乏有说服力的推销手段，缺了一个普适的震慑手段，因而无法用可行的“他律”，去代替毫不可行或起码是极度有限的“自律”。

提供这个“他律”手段的“革命工艺学”，不是董仲舒也不是程朱发明的，而是无数落魄士人实行“三教合一”的辉煌成果。只需看一眼《两刻三言》，《聊斋》等章回小说，立刻便能洞见这一点——几乎没一篇不是“文以载道”的政治宣传品，宣传儒家那套天理大义，也没一篇不把佛家的因果报应用作劝善的强大手段。而这些垃圾又被更劣等的文人编成评书、唱词、戏剧，成了社会各界唯一的娱乐内容，把所有的人一网打尽。无论贤愚不肖，达官贵人，文人骚客，贩夫走卒，村夫市侩，统统给罩在那洗脑的大蒸笼里。余生也早，颇认识许多前清或民初生的前辈，凡是女性长辈都不识字（“女子无才便是德”么），连一句孔夫子的教导都背不出来，但儒家的基本教义完全成了她们的行动本能，而支配她们行动的潜意识动机便是冥报。

冥间的威慑力当然不是无限的，阎罗殿里上刀山下油锅虽然可怕，比起朱元璋在此世的剥皮实草毕竟遥远得多，然而就连挂在县官大堂上的前任人皮标本都无法遏止贪污的洪流，冥报又何足道哉？诱惑大到一定程度，便是不可威慑的了。这结果便是造出一个两元背反的病态社会，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准与受诱惑的可能性（亦即社会等级的高低）成反比，如陈寅恪所说：“中国之人，上诈而下愚”，跟孔孟设想的“道德梯度也就是社会等级梯度”完全相反了。这种病态社会之所以能长治久安，靠的完全是下愚麻木不仁提供的稳定性。

这就是西洋文明入侵为何会摧毁了中国传统文明的精华，只留下烂污货来——“破除迷信”一劳永逸地取消了冥报的威慑。在这种情况下，若还想维持“人生而不平等”的等级社会，当然只会造出一个上下俱诈的恐怖社会来。而且，离开佛家的“革命工艺学”，儒教就再也不是教了，任何复活那空想主义的企图都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

二、文明的优劣

从上节论述中不难看出，不同文明当然有高下之分，否则中国的显性文明也不会荡然无存了。这与野蛮人毁灭了古罗马的文明、蒙古人毁灭世界一流的南宋文明可是两回事—

—鬼子并没用暴力在中国“大破四旧，大立四新”，传统文化是在和平竞争中不战自溃垮掉的。而且，无论政府怎么奖掖扶持，都是烂泥糊不上壁，台湾便是明证（其实在此之前已有先总统袁公尊孔祭天，然而仍然无法抵挡新文化运动，后总统蒋公的新生活运动难挽颓波等先例了）。因此，至少可以相当安全地说，不同的文明可以具有不同的感召力与和平竞争力，具备更强大的感召力的文明可以轻而易举地和平摧毁相形见绌的文明。

在旧作《文明的优劣与种族的优劣》中，我指出，文明的优劣有两重涵义，一是美学上的，二是功利上的，前者是指智力活动水平的高下、精粗、美丑，而后者是指感召力、煽惑力、侵略性的强弱。在两个意义上，华夏文明相对于西方文明都是一种劣等文明，当然要在后者入侵时垮下来。光看现在有这么多爱国同志热心捍卫国故，便可知它的彻底灭绝是注定了的——倘若一种文化需要大声疾呼去抢救捍卫，那便只能是一种生命力或繁殖力极差的濒灭物种。

相对于西方文明，华夏文明在智力层次上的劣等，对中西文明略有所知者应能洞察无遗。所谓国学就只有德育一门，却连这都玩不转，连基本假设都是错误的，只能弄出个空想主义来，傻傻地指望每个社会成员都会去“克己复礼”，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天天跟自己过不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存天理，灭人欲。在今天这人欲横流的物质世界上，这些教导小青年们只能做到前半截：“非礼。”起码每个男青年与女青年外出时，想的都是如何非礼对方而不引来强烈反弹，而那女的暗自盼望的也是对方来非礼自己。一种与人性相反的说教，哪有什么复兴的可能？

更别说圣贤思维能力之低下，令人瞠目结舌。两千年过去，除了荀子师徒那对白乌鸦，竟然无一人能清晰思维，准确表述，自圆其说就更别指望了，连编本教科书的本事都没有，所有的圣贤经典都是天一句地一句的派对聊天录音稿。就这水平还配去跟西学竞争？

我上小学六年级时，算术应用题里那“整数 1”似乎是攻关难题：前进电器厂去年生产了 1200 台电动机，今年比去年多生产 1/3，问今年生产多少？大家原来会的是先用 1200 乘以 1/3，得出 400，再加上 1200，即得正确答案，而老师却要来多事，教大家列出 1200x（1+1/3）来，把全班同学一股脑儿打进了闷葫芦：那 1 是哪儿来的啊？老师费尽移山心力，才让大家勉强记住，那 1 是所谓“整数 1”，代表去年的产量。讲到最后，大家牢牢记住了如何照猫画虎，然而这么做道理何在，仍然是迷迷糊糊的，直到进了初中也不大明白。后来学会解方程，再回想小学那些高精尖难题，顿觉“一览众山小”，从此算术再无难题可言。于是不禁暗自纳闷：为何要让学生花 6 年的时间去学无比笨拙的算术，何不直接教代数？例如有如去讲那 “整数 1”，何不弄个 x 进去？那还要容易理解得多。

中西之别似乎也就是这样，对没看过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人，拿“整数 1”去糊弄他们，吹为人类智慧顶峰，倒也不是问题，但对掌握了初等代数的人，还要逼他们去承认算术的优越性，那就是做梦了。

这比方当然蹩脚，不过虽不中，不远矣。方今之世，凡是叫卖国学者，都是中文系那落第秀才收容所里出来的（有的连那收容所都没本事进去，东海一枭便是这样）。他们学文，并非天性爱好，亦非擅长此道，而是因为天资低下，无望学会数理化，因此只好去学识字即能掌握的科目。当年在中学搞文理分科，除个别例外，文学才子们全都集中在理工班，文史班被咱们称为“闻屎班”，这与古代还完全不一样，那时只有一门，无论贤愚不

肖都只能在那里面折腾。

这结果，便是叫卖国学者反不如诋毁国学者懂国学。国学专家们绝无可能如我这样，清晰地、准确地、客观地总结转述其要旨。这倒不完全是天资使然。现代大儒们的尴尬是，他们没有传统社会的生活经验，又多非旧家子弟出身，根本不曾见识过真正的儒家生活环境是什么，却生活在被西方文明无微不至地侵润腐蚀了的现代环境中，于是便“甚荒唐，反认他乡是故乡”，把大量洋货误当成国货吹嘘。若不是老芦点破，则他们便到死也不可能知道现代汉语的绝大部份词汇都是从西方进口的，而他们使用的大批概念乃至论证方式都是舶来品。

更糟糕的是，现代国学专家们都是井蛙，对西学一无所知，更未掌握西式思维的基本技能，毫无比较文化的视角，只能死记硬背经典，绝无可能融会贯通，更不可能用逻辑思维去整理国故，遑论洞察其弊病或缺陷。例如孔教毫无“权利”这个概念，此乃它与西方文明竞争时的致命死穴。但不懂西方文化 ABC 的人是绝对看不见的，因为他们自己就没有 “权利”这个概念，更不知道孔教的基础是集体主义，而现代民主理论的基础是个人主义。

正因为此，市井青皮大儒东海一枭才会闹出把牛逼扯到马胯上去的笑话，竟然有本事把春秋大义与民主混在一起，一面亲力亲为上网竞选“总统”，一面奢谈“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丝毫不知按正宗儒家的观点，他不过是个犯上作乱、讪上卖直的识字响马，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就是于丹、蒋庆、东海这些卖假药的三鹿文盲的胡闹，才使得“大儒”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成了辱称。

这还不限于儒学，所有国技都如此：西医可以轻易学会中医，西画家可以轻而易举地画出国画，西方作曲家可以轻而易举地作出中国曲调，四川美院的师生可以轻而易举地制造出胜过绝大部份传统泥塑的《收租院》，反过来可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这正如初中差生可以轻易解决难倒小学尖子的算术题，而小学尖子绝无可能解决代数问题一般。这比喻不恰当之处，大约只在于东西文明的差距远不止代数与算术的差距。

从功利的意义上来说，华夏文明也不堪一击，绝对无法抵御人家的糖衣炮弹和化为美女的毒蛇，只会自动崩溃。近现代中国的一切动乱，都是显性文明在外来价值观冲击下土崩瓦解，精英阶层中出现空前的思想混乱引出来的。换言之，那是“文明真空” 的必然结果，这就是李鸿章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华夏显性文明之所以不堪一击，是因为它的基本假设和运作方式有悖正常人性，只能在扭曲人性的前提下工作，于是当西方更符合人性的价值观涌进来之后，这种人为设计便再也撑不下去了。这与资本主义世界靠和平竞赛冲垮社会主义阵营十分相似，后者的基本假设与运作方式同样违反人性，当然也就无法长期与资本主义竞争下去。

上面已经说过，儒家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人生而不平等”，处于社会和家族（两者其实是一回事）下一个等级的人必须绝对服从上级，在生活的一切方面（包括穿什么样的服装，乘坐什么样的车辆等）处处严守与上级的不平等待遇，毫无权利可言，而处在上一等级的人必须知道疼爱下一等级的人，作威作福是应该的，那是你份内的待遇，但你不能像富士康大班们一样，逼得下级去跳楼。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意思。后来董仲

舒增加了“夫为妻纲”，实际上多出了一条“夫夫妻妻”，只是没有列入经典而已。据说，这就是缔造和谐社会的正道。

那么，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又该怎么办？孔子从未正面论述过这一问题，但他最恨的是“臣不臣”（也就是臣子胆敢不守本份，要干超出自己身份的僭越的事，哪怕那只不过是在家里摆设了一个只有君王才配摆的屏风），而不是“君不君”。他之所以要无耻篡改鲁国的历史《春秋》，全部目的就是为了震慑不守臣子本份的“乱臣贼子”。孟子则与他侧重不同，更强调“君君”，也就是劝诫君王们爱惜百姓。荀子是古代中国绝无仅有的天才，开始认识到真实的人性。他的关注重点类似孔子，也是“臣臣”，但他比孔子更像个政治学家，因而能想出一套实际政治运作术来，那便是“隆礼重法”，不但要以“隆礼”（建筑壮丽的宫殿，举行盛大典礼等等）来提升君王权威，而且要用“重法”来严惩那些敢于挑战君王权威的人。更结棍的是，他首次想出用统治者的荣辱观去为百姓洗脑，使得百姓爱君王之爱，恨君王之恨，形成牢不可破的风俗，以民间私法来严惩犯规者，自觉维持既有的上下尊卑等级，这就是后来朱熹说的“化民成俗”。

在我看来，荀子的教唆便是隐性文明的来源，也就是上述那根贯穿了两千年中国文明史的“灰线”的起点。我在旧作中指出过，儒学变成一种可实作的政治学，靠的全是荀子。实际运转的儒教是“外孔而内荀”，只是荀子实话实说，不利于欺骗麻醉百姓，因此君王们只尊孔孟。其实离开荀子“隆礼重法”、“化民成俗”那一套，儒学根本没有实作可能。因此，荀子才是“儒教工艺学”的创立人。汉宣帝所谓“汉家制度，霸、王道杂用之”就说穿了这秘密。

董仲舒当然也有贡献，那便是他的“君权神授”与“天人感应论”。“天命论”其实是《尚书》中早就有的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首次将这话发挥为“上天根据民意挑选君王”说，其原意是用来“君君”的，而董仲舒则一方面将君王说成是天命代表，让一切胆敢臣不臣的野心家们死心，为“臣臣”提供了强大的形而上震慑力，另一方面也发明出“上天示警”说，算是向皇帝施加了有限的约束力。相比孟子而言，他的天命论是极大退步，尤其他那“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就完全冲销了孟子“老天爷是百姓的后台”论。

至此，孔教算是发育成熟了：既有老董提供的形而上论证，也有荀子设计的实作方案。等到佛教传入中国，儒家的教条便借用因果报应，以通俗文艺为载体，渗入草根社会，变成了全民包括文盲在内一致信奉的国教。它的整个运作点，便是维护既有等级秩序不被不守本份的暴民推翻：此世有灭族、寸磔（亦即千刀万剐）、大辟、腰斩、枭首示众等各种酷刑，而彼世则有刀山火海油锅大锯大磨（过去寺庙里都有此类生动壁画，只是后来我党破除迷信涂掉了）。最重要的还是，佛教为受苦受难的贱民们提供了希望：只要苦忍，下辈子就会生为人上人。

和谐就是这样炼成的，稳定也是这样炼成的。不能不说这设计非常之聪明，省去了常备军，国安部，公安部，中宣部等一系列镇压硬件。

可惜“太阳出，冰山滴”，待鬼子的“人生而平等”的异端邪说涌进来时，整个和谐体系便稀里哗啦垮成一片，扶都扶不起来。究其本质，无论是“人生而平等”，还是“人生而不平等”，都是无从验证的公设，可比较的只是功利与道义，而孰强孰弱是明摆着的。以

功利而言，人类有智力，因此不可能结成蜂群社会，由亿万工蜂苦吃苦做，傻傻地奉养一小撮四体不勤、百花不分的蜂王和雄蜂。处于下一等级的人总想“翻身求解放”，一旦得知自己当人下人并非天意，也没有什么来世福报，那当然要“奴隶代代求解放，战鼓连年起四方，只因为，行程渺茫无方向，有多少，暴动的英雄，怒目苍天空怀壮志饮恨亡！农民武装必须步步跟定共产党，才能够，节节胜利蒸蒸向上涓涓细水入长江，细水入长江！”（Oh，how I love Yang Chunxia!）

这惨痛损失，就是我们永远无法填补的文明真空。光是天命论的倒台，便决定了现代专制制度再也无法如旧式帝制那样长治久安，党皇永远处在大司马大司空们的威胁下，统治集团的内讧永远是最大的潜在乱源。更不必说取消冥间惩罚与“来世退赔”的奖惩政策使得贱民们再也没了盼头。我党上台后猛破“四旧”，彻底破除迷信，恶化了这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换言之，文明的真空，使得社会再也没有了维稳软件，只能以“买静求安”与武力镇压两手作为等而下之的代用品。老邓所谓“发展才是硬道理”，其实说的就是“在官定意识形态破产后，便只能买静求安了”，然而买静求安的前提，是经济必须持续发展，让大部份精英有“日子会不断改善，越来越好”的盼头，一旦这盼头失去，麻烦就来了。倒不是说精英们有本事推翻我党，而是普遍不满会增加社会的动荡度，就算是不在党内诱发大规模内讧，起码也得让我党到处灭火，疲于奔命，一夕数惊。此所以鬼子要说，我党现在是在演某部好莱坞电影，驾驶一列装了炸弹的列车，只要时速低于 60 英里，则火车就要爆炸，这就是政府为何会以“保八”为全国努力目标。那在他们其实是“政权保卫战”。

现代专制者们最尴尬之处，还是再也无法垄断道义资源了，从此成了孔老二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我党纵然百般抵制 “普世价值观”，辱骂诋毁民主制度，却从来不敢如孔教那样，光明正大地说出自己的价值观就是“人生而不平等”， “鞋子”只能逆来顺受地让“帽子”骑在自家头上，决不能“冠履倒置”；更不敢声称“受命于天”，断然否认 “主权在民”，却被迫把这些“普世价值观”写在宪法总纲里，还装模作样地为公民规定了一系列基本权利，唯一能做的事便是暗渡陈仓，冒充“万年人民代表”，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全由谎言堆积而成的政治文献。

这与儒教可是两回事，你可以指责它不合理，不公平，但无法指责它不诚实——人家从来就没有平等的概念。诚然，孔孟之道是空想主义，严重偏离了人性，推行它必然造出一个伪善社会，但这并非孔孟原意，正如你不能指责后世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利叶等人是骗子一般。孔孟也不是那条见不得人（当然只是见不得洋人）的“灰线”的发明人，是荀子以降的儒家塞进去的。而且，即使用孔孟原教旨，那灰线仍然能强辩过去。

例如诚信是儒家强调的美德之一，不但孔子说什么“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而且后儒还总结出“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来。然而古人从不知信义为何物，楚汉相争时，项羽“与汉王约，中分天下，割鸿沟而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羽解而东归。汉王欲引而西归，用留侯、陈平计，乃进兵追项羽”——前脚才与人家订了和约，以鸿沟为界平分天下，后脚就有本事毁约追击。大宋和大金、大元先后翻脸，都是出尔反尔，立约毁约，试图欺骗蛮子，这才被蛮子痛打。这传统一直保留到清朝。第二次鸦片战争

之所以爆发，乃至扩大恶化到鬼子攻入北京，完全是因为朝廷反复立约毁约，一再试图欺骗蛮子。然而这种无耻行为（比吸食安非他命似乎还更无耻些）绝不会困扰君臣们的良知，盖他们认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诚信只适用于上等人（最后缩小到只是不能欺君，就连这都未必能做到）。对造反的野蛮人或是下等人使用这一手乃是应该的，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人。

因此，林则徐不但向道光献计发动人民战争，建议用兵勇化装为百姓去诱骗袭杀英军，而且在云南镇压练匪暴乱时诱降杀降，干出这种下作烂事来后，还不以为耻，自吹近年大有进步，运用兵法颇有神鬼莫测之机。这么干的绝非林公一人。骆秉章在诱降石达开后出尔反尔，杀害了放下武器的两万多髮匪。李鸿章也在洋枪队攻下苏州后，杀害了戈登招降的几个伪王，让戈登那在欧洲军人荣誉感中长大的帝国主义军人大骂流氓，几乎带兵去把李鸿章干了，并拒绝领取朝廷发给他的重赏。但这些对老祖宗来说都不是问题，盖他们有点像后世的马列主义者，认定自己是在卫道（=“捍卫客观规律”），凡是逆天行事的匪类都该无情除去，无论使出何等下作的手段来都是“兵法”。咱们全民引以为荣的龟孙子兵法就是这么来的。

可惜鬼子们却给现代专制者们造出了无法解决的难题。我党既不能如儒家那样，公开宣布人分“君子”与“小人”（亦即党朋说的“狼”与“羊”）两大类，“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而无情屠杀反抗的下等人乃是实现“菩萨心肠”的“霹雳手段”，又不敢坚持毛泽东思想，声称“民主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把一部份人民开除人籍，教唆煽动组织其他人民去百般虐杀他们，以此获得一种病态的“当家做主”解放感，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便首次出现言行彻底背反的“逆规则”现象，统治者成了不折不扣的僭主，无论是对毛左还是对自由主义者，都永远暴露着一个无法遮盖的软穴，永远无法理直气壮地从理论上证明自己执政的合法性。这软穴在天下无事时当然不会发作，但若党内大规模内讧爆发，则蓄意抢夺大位的人，无论是打出毛泽东的旗号也好，打出西方民主自由的招牌也罢，都能写出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先声夺人的檄文来，而党皇根本就无话反驳。老邓当年之所以要“不争论”，其实便是自认永久丧失了所谓“话语霸权”。

鬼子的意识形态入侵造成的第二个重大文明真空，乃是国人永失淡泊自甘、安贫乐道的传统生活方式，改用美式物质主义生活方式。

无论是儒道释哪一家，都谴责物质享受，美化贫穷，都有禁欲主义倾向，因而压制物质文明进步，认为那只会败坏世道人心。陶渊明诗曰：“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他还漏了“君子谋道不谋食”那句更结棍的先师遗训。孟子认为逐利活动会刺激人欲暴长，令人贪得无厌，互相攘夺，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因而将“利”和“义”对立起来，认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主张“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正当的行为动机只能是仁义而不能是利欲。到宋儒更是走火入魔，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这一套在鬼子进村后便自行崩解，但在毛泽东手上又得到空前复兴。可惜如古代一般，它只能在一个封闭系统中工作。待到国门一开，这短暂的回光返照又给抛进了“历史垃圾堆”，今日“上下交征利”的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鬼子便骑火箭也追不上。

这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孕育着的社会危机，当在后文详述。这里只想指出，光是发生了上述两个文明损失，中国人便丧失了传统生活方式，显性文明中再也没有传统华夏文明

可言了。而且，这两个损失都永无希望寻回。但离开了它们，哪里还有什么有别于其他文明的华夏文明可言？

因此，国学派声称“华夏文明是世上唯一持续存在两千年的文明”，属于一种自摸行为。方今之世，根本没有什么显性华夏文明（亦即传统文化）残留物存在，剩下来的只有隐形文明也就是烂污生活方式，以及毫无礼义廉耻的骗人坑人害人欺人整人控制人的龟孙子兵法。“道统”与“文统”都已作古久矣，“政统”也不能冒充血统纯粹。除了所谓“元朝”那 162 年的间断，中华帝国当然一直存在，然而连俄罗斯帝国都不如——人家自成立起便没让异族征服过。

国人可以自慰的，便是征服大明帝国的外国人被咱们的烂污生活方式同化了。如果这能当成民族光荣，那么伤寒杆菌、鼠疫杆菌、霍乱球菌等等似乎比咱们还光荣。而且，咱们之所以能向蛮子撒“化尸粉”（典出《鹿鼎记》），完全是因为地理隔绝造成了东亚只有一家文明。用这种静止的封闭系统去与处在持续变化的开放系统里的欧洲帝国相比，绝对是科盲才能干出来的事。

十年前跟赵无眠辩论时我就指出，以为日本征服中国后会走上满人的道路是异想天开，盖人家挟二手西洋文明而来，并非无文化的蛮子。在这种“亡天下”的实在威胁下，中华文明能否存活下来，根本不必看光复前的台湾，看看海外华人便知结局了——凡是东南亚华人的后代都顽强地保留了中华文化，以致 60 年代回来的印尼侨生毫无语言障碍，能顺利插班上课，尽管人家的先辈是几百年前出国的。即使要去所谓“华侨补校”恶补，补的也是数理化而非中文。可欧美华人别说传几十代，就连第二代都是黄香蕉，许多人连汉语都不会说。这就是最能证明各种文明孰优孰劣的社会实验。

至于 4747 网友盛赞的“中华文明阴柔之美”，也是那伙自摸家发明的。那伙人是隧道眼，至今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还停留在 170 年前的琦善、林则徐的“器物”层次，以为鬼子只有坚船利炮的硬气功。其实鬼子给中国带来的最大麻烦，不是武力征服（人家也从未试图这么做过，即使是日俄也只是想肢解中国，但从无计划全面吞并中国），而是软性颠覆。上文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太阳出，冰山滴，鬼子带来的全新价值观，一劳永逸地腐蚀融化了中国赖以立国两千年的伦理基础，使得显性文明轰毁于旦夕之间，国人就此失去最适生活方式，至今找不到一个自稳的价值体系，建立与社会文化传统基础匹配的社会制度，因而永远处在动乱的威胁中。这就是中共封网的根本原因所在。一种强大的文明，是绝对不会去把虚弱的文明堵在外面的。

三、文明竞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文明竞争，一些文明胜利了，一些文明消失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他从苏联抄来的屁话，让老芦略加篡改，便立刻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也算是他前世修下的福缘吧。

但这话若是让那蠢娖看见了，定要指责我贩卖社会达尔文主义，盖文科蠢娖的绝技，便是卖弄她们丝毫不懂内容的术语，把各式各样的标签钉到论者的印堂上去，这就是她们的“智力活动”。老芦的锦绣文章不是写给这些蠢货看的，所以当然不会理会其反应。勿

过，鉴于并非所有的同志都知道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怎么回事，又错在何处，所以还是得讲解一下。

许多人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当成是把达尔文主义运用于社会学领域，其实完全弄错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论者连达尔文主义的要旨何在都没拎清爽，以为“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便是“弱肉强食”，由此得出斯大林的“落后就要挨打”。活在这世上，谁没有獠牙，谁就得被强者撕成碎片。那也是活该，因为据说那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用阿随的话来说便是“狼吃羊是宇宙运行规律”，这就是纳粹当年的官方哲学，也是大陆现在的隐性国教。

先不说生物学原理是否能直接照搬到社会学领域里去，光看此论的“生存竞争”都与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八万杆子打不着。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观念，并不是什么“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而是生物在外界施加的各种压力之下挣扎求生，比赛应变能力，最能应变的便能存活下来。这压力中当然包括弱肉强食，但并不是说弱者就一定会绝种。更不是说弱者被强者无情吞噬是自然规律决定的。如果达尔文主义就是这个意思，那 TMD 也太没水平了。

因此，生存竞争的筛选指标是物种的应变调适能力，它筛选出来的是那些最适应于改变了的生存环境的物种，因此叫做“适者生存”，并不是“强者生存”，否则恐龙也不会灭绝了。论强大，老鼠连猫都比不过，遑论豺狼虎豹，然而我敢断言，若是地球生存环境发生剧变，物种灭绝，那活到最后的哺乳动物必然是老鼠。猛兽灭绝的先例多的是，然而老鼠基本无可能变成濒灭物种。所以，希特勒党徒搞的那套，完全是拜错了菩萨。

可笑的是，反对他们的力薄儒（liberals）也未见得高明。Liberals 中愤青比较多，而所谓愤青便是肾上腺素较多而脑汁较少的同志（看来我这 3/4 力薄弱的成色还得减少一点，或许是 1/2，要不就是 3/5 吧）。他们痛恨纳粹的丧心病狂，却没足够的智力看出纳粹的理论错在何处，便去发明出针锋相对的 “文明无优劣”论来，而且弄成一种“政治正确”的白色恐怖，我看完全是矫枉过正。例如黑非洲许多地方连文字都没有（引入英文不算，那不是原生文明），“文”之不存，“化”将焉附？莫非楞要抹煞事实，昧着良心说他们创造了与古希腊罗马一样辉煌的文明，才能算有良心，讲人道？

不过，也不光是力薄儒没看出纳粹错在哪里，看出纳粹对达尔文主义的误解的人倒是不少，但似乎没谁说过下面这些话：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纳粹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思路一模一样，两者犯的共同错误乃是科学主义（或曰科学教）。两家都以为在人类社会里可以“自觉运用客观规律”，为此动用国家暴力，大规模运用他们认定的“客观规律”去改造社会，因而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最恐怖最血腥最黑暗的一页（两页？——共页大，纳页小）。他们不知道：

1）人类社会里未必有类似自然界的规律，即使有，也很难证明，因为系统太复杂，参数太多，又不可控，很难使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去作受控重复实验。

2）即使真找到了此类规律，那主动去运用它也是笑话。早在旧作中说过了，马克思预言，无论人类主观愿望如何，共产主义都必然要来到。既然那是一个冥冥之中注定了的必然

过程，那就不该也不可能主动去干革命。人类可做的，就是跟预言哈雷彗星何时再度光临地球附近一般，通过精密观测与仔细计算，准确预言共产主义已经走到了哪一步，何时会安抵德国（或俄国或美国或中国或全世界），而绝无可能去加快这个业已事先决定好了的客观必然过程。

3）即使是真正的科学发现，也不能胡乱运用于社会。例如优生学确实是科学，挑选良种、淘汰劣种已经在农业和畜牧业领域里运用多年了。但这一套不能胡乱搬到人类社会里去。根据优生学原理，像寒江月那种白痴只该被人道毁灭，以免谬种流传后世，但只有纳粹才能干出这种丧心病狂的烂事来。容忍寒氏一类谬种流传，乃是文明社会必须支付的代价。这代价是为维持人类与魔鬼的分界线而付出的。

这个简单道理，伪经济学家们却到死都不能明白，总是幻想经济学可以成为一种真正的科学，其揭示的“科学原理”可以被人类主动运用到社会中去，使得经济变成一种理性的科学的运动。我已经反复告诉他们了，这是做梦。世上没有经济学 per se（不知道此话怎么翻译），必然要跟政治裹搅不清，经济只可能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哪怕你真的建立了一套极度合理的体系，那它要能从纸面上搬到现实中去，还得恶霸工会点头，而这多半没戏。只有共党国家才能压服一切异议集团，强行推行某个“科学规律”或“科学体系”，可惜那根本不是自由经济。因此，所谓自由经济学派，完全是一种自相否定的东西——只有靠不自由的手段，才能推行他们理想的自由经济。

4）因为以上原因，随便把自己认定的“客观规律”运用到人类社会中是非常可怕的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血腥历史已经昭示过这点了。所以，社会科学家们可以用各种学说解释人类社会，但决不能用那些学说去改造社会或是干预社会运转。换言之，与马克思的名言相反，哲学家们和社会科学家们的任务，不是改造世界，而是解释世界。例如社会达尔文主义若不拿去实践，只是停留在纸上，那就什么祸害也没有了。此所以我一听见我党“科学执政”的豪言便两股战战，不知道下一步他们又要制造出什么大难来。

因此，我这伪劣假冒的三鹿社会学家可以做的事，便是提出一个假说来穿凿已知现象，谦卑地推测文明消失或变样的原因以及具体机制，并据此猜测未来走向，并不敢坚持大众必须无条件接受我界定的文明优劣标准，更不敢主张或提倡用优秀文明去消灭落后文明。毕竟，文明的消失是一种多次发生的现象，这是无法否认的。欧洲原来有多种文明并存，后来融合为一种欧洲文明，许多原生文明都消失了，中国在远古时代也发生过类似变化。这些现象既然存在，总该设法找个解释吧？

当然，文明消失的情况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既可能毁于蛮子之手（例如古罗马文明毁于蛮族，南宋文明毁于蒙古人），又可能毁于文明自杀（例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世纪欧洲教会实行意识形态的宗教管制，共产主义世界实行实行意识形态的邪教管制等等），也可以是文明间和平竞争的结果（例如近两三百年来西方文明相继摧毁了地球上的其他文明）。我想探讨的，只不过是最后一种情形。

窃以为，不同文明和平竞争的过程和结果，既不是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也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编造的“生存竞争，优胜劣败”，情况要比生物界复杂得多。

首先，文明竞争中获胜的一方，通常是功利上强大的一方，因更符合人性而胜出，但未必在美学上更优秀（亦即智力层次更高更复杂更精美），并不总是“优胜劣败”。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肤浅的平民消费文化风靡欧洲，取代了此前精致得多的贵族文化，这似乎应该称为“浅胜深败”。而如果秦晖教授说的“世界中国化”是个真实的威胁，咱们撒出去的“化尸粉”真能烂掉全世界的话，那么这种过程类似于中世纪黑死病、鼠疫流行杀死了欧洲的大部份居民一般，只能称为“脏胜洁败”。

其次，就算是智力上更高级更优秀、道义上更合理的文明摧毁了落后腐朽文明，那也未必能全面取代它。而且，所谓“摧毁”也未必是全面摧毁，常常是“毁其精华，留其糟粕”。此外，入侵方的“胜利”可以毫无意义，未必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反倒可能给双方都带来灾难。反过来，入侵方的“胜利”也未必是失败方的损失，可以是双方获益的事。

最后，对某个特定国家来说，最优秀的文明未必是最适文明，未必能让人民受益。即使全球文明竞争淘汰了所有不够优秀的其他文明，只留下道义上最合理，智力上最优秀的一种文明，实现了“世界大同”，那文明能否长期存在下去，还在未定之天。

由此可见，文明竞争的情况很多很复杂，本文考虑的主要是文明冲突，特别是政治文化（含社会制度）的冲突。

文明冲突多发生于内涵价值体系差异很大的两种文明之间。冲突的主体，一般是被入侵一方的隐形文明反抗外来的显性文明。若本地隐性文明与外来显性文明的内涵价值观分歧不大，两者就不会发生激烈碰撞，可以和平引入。被引入的显性文明在被原有的隐性文明修饰（modify）之后，便变成了一种能持续生存的新的整合文明。这种整合文明在与外来文明有同有异，并不是外来文明的忠实复制。中国引入印度的佛教文明，日本引入西洋文明都是这种例子。

若是被入侵方的隐性文明与外来显性文明的内涵价值观念体系格格不入，则入侵必然引起强烈反抗。反抗的主体是本地的隐形文明。若是外来文明非常强大，摧毁了土著显性文明，在表像上取得了胜利，则隐性文明必然要全面篡改外来的显性文明（尤其是外来制度和政治文化观念），使之变得形似而实非，形成一种以外来显性文明为表，固有隐性文明为里的“镀金文明”。在这个工作完成前，社会必然动荡不安。在本土隐性文明大幅度修改外来显性文明后，若系统处在封闭状态下，则社会可以复归稳定。然而若是系统未能彻底隔绝与外来文明的联系，致使外来显性文明能渗透进来，则必然又要引起新的冲突，造成新的社会动荡。

这就是苏联和中国走过的路：中国在晚清和民初全面引入了外来制度和其他西方政治文化观念，但因为它与隐性文明格格不入，于是便引起大规模动荡，最后造出一个以民主为表、专制为里的假民国来。系统因为处在开放中，便陷入无休止动荡。直到后来中共上台，将系统彻底封闭了，用固有的隐性文明（“灰线”）全面修饰了外来的显性文明，制造出了一个空前稳定的国家。此后系统再度开放，便再度陷入混乱中。动荡只是被强力压下去，暂时（50 年也是暂时）没表现出来而已，但未来肯定还会大规模爆发。上文已经说过了：咱们失去了传统社会的自稳软件，又无法引入西式自稳软件。

俄国的情况也类此，19 世纪中晚期，该国君主试图引入西方先进制度，激发了与隐性文明的大规模冲突，最终导致一个隐性文明主宰之下的封闭系统。但该系统毕竟无法彻底隔断与西方先进文明的交流，于是在上世纪 80-90 年代再度动荡，再度引入西方制度，再度被隐性文明修饰，直到磨合出了一个虚有其表的假民主共和国，才又重获暂时的稳定。

因此，准确说来，文明的彻底沦亡是不可能的，沦亡的只是显性文明而非隐性文明。而文明落后国家的普遍悲剧，便是外来的显性文明与原生的隐性文明格格不入，使得社会陷入长期动荡之中，类似产妇在分娩后，因胎盘剥离不全而引起长期大出血。那胎盘不拿掉，流血就不会停止。

四、中式趋同与隐忧

至此可以回答前文引言中提出的第三个问题：

“不同文明是趋同还是趋异？如果是趋同，是强大的先进的文明吞噬了弱小落后的文明，还是熬成一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杂烩？所谓‘强大’‘先进’云云，到底如何判定？”

我认为，在全世界范围内表现出来的落后文明被先进文明取代的表像，造成了“文明趋同”的错觉。但中国和俄罗斯走过的道路，显示了本土隐性文明的顽强生存力。两个国家折腾了足足一个多世纪，死的人加起来肯定上亿，然而隐性文明蕴含着的全民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之间的距离，似乎比一个世纪前更大了。光是这个事实，就严重质疑了“世界终将实现民主大同”的先验认定。若再把伊斯兰世界考虑进去，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者们的这一信念就更靠不住了。因此，我这个悲观主义者的感觉是，已有证据并不提示人类有实现民主大同的光辉前景。

当然，这不是说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没有趋同的部分。在我看来，西方文明之所以“强大”、“先进”，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和平瓦解颠覆其他文明，靠的主要是两条，一是“人生而平等”的个人主义权利观，二是“在不侵犯他人权界的前提下发财致富、追欢逐乐是公民的天赋人权，谁也无权剥夺”。这两个公设虽然都符合人性，但它们由此获得的感召力（因而也就是对旧制度的颠覆力）并不相同。第二个武器的威力更强大，而迄今我们观察到的所谓“文明趋同”，主要就是表现在这个方面。

我在旧作中指出，“马恩在《共产党宣言》承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 100 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可笑的是，他们只看到了现象，却从未能看出机制何在，那就是去除了权力对资本的压制、盘剥与侵占，以及道德对个人正当致富欲望的捆绑。”

这说的其实就是西方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肯定人类欲望的正当，把追求欲望的满足当成了天经地义。用文言来表达就是“人欲即天理”。这是文艺复兴运动给欧洲文明带来的最重要的观念变化之一，也是此后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显著区别之一。在此之前，欧洲的基督教文明与其他文明也差不多，同样有着禁欲主义倾向。在此之后，欧洲人的创业精神便从禁欲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资本主义这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制度，以雷霆万钧之势，排山倒海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成了西方人改变

其他民族生活方式最卓有成效、最醒目的成果，连回回世界都难以抵挡那巨大的诱惑。

记不得是契诃夫还是谁写过一篇短篇小说：

一个风尘仆仆的过客，到深山的修道院去投宿。他看到修士们简单淳朴的生活方式与崇高的道德境界，无任欣羡，便跟僧侣们说起山下城里居民们的种种堕落：奢侈腐化，吸烟酗酒，嫖妓赌博等等。那过客次日就走了，然而修道院的长老却无法恢复平静的心境。经过苦思，他召集了全院僧众，宣告上帝给自己的使命，是前往那罪恶的城市，去把那些堕落者拯救出来。

半年后的一个晚上，长老回来了，跟去时面目全非，完全是个精神上被彻底摧垮的人。面对僧众们的惶惶询问，长老什么也没说，只是步履沉重地走进了他的卧室，倒在床上呻吟了好多天。全体僧众都惶惶不安，不知道他究竟出了什么事。

最后长老总算爬了起来，召集全体僧众，沉痛忏悔他在那罪恶的城市里的堕落，详细生动地讲起那些变成美女的魔鬼是何等邪恶，其诱惑是何等难以抵抗，而他本人又是如何滑进了罪恶的深渊。最不可饶恕的是，他在堕落中，竟然感受到了平生从未感受过的欢乐，甚至觉得只要领略过这种快感，便是在地狱里受熬煎也值了。最后，长老泣不成声，跪在十字架前沉痛忏悔，声称自己再也没有道德资格指导僧众们的思想改造活动。

作了这忏悔后，长老如释重负，恢复了既往平安喜乐的心境，那天晚上首次甜甜地睡了一个好觉。次日他醒了过来，觉得很奇怪：修道院怎么如此寂静，听不到那熟悉的诵经声？爬起来出去一看，哪儿都见不到人影——所有的僧众都下山跑到那罪恶的城市里去尽情堕落了。

中苏就是那个修道院。马克思在创作他的地上天国时，忘记了“私欲才是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因而发明了一种违反人性、毫无生机的修道院。它的运转前提是封闭在深山中。一旦外界信息传入，僧众们便必然要起来造反，或是发动改革，把庙门打开，延入城里来的变为美女的魔鬼们，把古刹改为妓院。

说马克思主义乃至其他社会主义学说违反人性，指的就是它们忽略了人类的私欲。前文已经说过了，西方文明摧毁东方文明，资本主义在和平竞赛中击溃“社会主义阵营”，靠的都是这一条。莫斯科与北京不相信私欲，搞的其实都是新时代的“存天理、灭人欲”，最后只能灭了自己。反过来，一旦承认了私欲的正当性，则社会立即重获生机。无论是中国人民还是俄罗斯人民，如今都过上了祖辈从未梦想过的好日子。

要说文明趋同确实发生了，则我看也就是在这一点上——引入资本主义作为“历史的火车头”。中国人的贡献更伟大——咱们证明了“普世价值观”的“可约减性”（reducibility），上述那两条公设中，咱们只需取一条“发财致富与追欢逐乐是正当的”就够了，根本就不需要“不侵犯他人权界”的前提。相反，靠制度制造的不平等（所谓“低人权优势”）反而能更快地造成经济繁荣。

这就是中国奇迹的沉重涵义——它使得人民更加信仰祖传的“人生而不平等”的“普国价值观”。老金他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已经把这说得很明白了：中国就是有必要维持制度

造成的不平等。如果允许农民享受与城市居民的同等权利，城里的高楼大厦谁来建？《猫眼看人》的某位写手作了更生动的补充：一旦取消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优势”，则农村就不会再为城市提供廉价女仆（所谓“保姆”）乃至廉价娼妓了。秦晖教授说的更全面：一旦中国公民获得与西方公民同等的人权，则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的价格就必然由供求关系决定，再不能靠政权暴力去人为压低，中国必然要丧失国际竞争力，不可能再构成吸引外资的强大黑洞了。那么，使得全体中国人民无限自豪的经济奇迹就有可能迅速萎谢。

相信“普国价值观”的同志当然有道理，但问题是，这种社会可能确实很繁荣，但它绝无可能是长治久安的社会。要一个社会长治久安，光靠镇压硬件是绝对不够的，系统内部必须有个维稳软件，可咱们社会内部缺的就是这玩意。

前文介绍过，传统社会没有什么镇压硬件（起码用现代观点来看那威慑力约等于零，盖官府根本无法垄断冷兵器那唯一的暴力资源），但动不动就能维持几百年，靠的就是儒道释的维稳软件。可惜我已经指出，那套玩意早就土崩瓦解，而且再无复兴可能了：如今大众都是无神论者，有哪个小贩会蠢到去相信，警察或城管之所以能骑在他头上作威作福，乃是因为人家前世积了德，而他如果去痛打那烂仔一顿，死了就会在地狱里受尽煎熬，来世还会被罚生为猪狗？

因此，不获得这自稳软件，中国就永远只能是潜在的危邦乱邦，眼前这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盛世，就总是有可能在转瞬间便化为云烟。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深入人心，更极大地强化了这潜在的威胁。在新作《毛泽东论》（暂定名）中，我当指出，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所谓“毛泽东思想”根本不是什么思想家的思想，毫无学术价值。惟其如此，它才曾经是、而且还将是对中国影响至深至钜的至高无上的游民文化经典。据原工程兵司令陈士榘将军回忆：

“蒋介石禁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等革命书籍，他犯了个大错误就是没有禁《水浒传》等书，因为很多农民根本接触不到马克思主义的书，而且你给他看他也看不懂，如读天书，而《水浒传》通俗易懂，情节吸引人，个个人物栩栩如生，又特别符合中国贫富差别大、广大农民仇恨为富不仁的国情。我们很多将军、士兵都是看了《水浒传》才想到上山的。袁文才、王佐就是对《水浒传》非常熟悉的，他们在山上实施的许多战略乃至江湖义气都来源于《水浒传》。”

毛泽东思想与《水浒传》的区别，只在于后者在传统社会中是隐性文化，从未得到过官方正面肯定，而毛泽东思想在毛时代乃是新时期的圣贤书，由我党发挥国家宣传机器的全部效力，强行注入每个学童的思想深处，至今还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的指导思想，写在宪法总纲里。

很难想像，蒙受过这种“杀富济贫即天理”的“教化”的人民群众，在一个社会弊病丛生、道德全面崩溃的病态社会中，在遇到重大的天灾人祸时，还能像西方公民那样，谅解政府的苦衷，朝野同心同德共度时艰。我敢断言，未来中国若再度被暴力革命席卷，那也绝对不会是西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会是“等贵贱，均贫富”的毛式革命。现代中共政府的死敌，不是被大众唾弃、其号召力可以忽略不计的民主派，而是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民众。即使暴力革命可以避免，那未来中国不发生军事政变则已，一

旦发生，那野心家也必然要打出毛泽东的旗帜来。伟大领袖留下的丰厚的政治遗产的道义优势与强大号召力，在一个打着毛的招牌走资的国家构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政治资源。野心家们不去开发利用，根本就是不可能设想的。

这就是中国社会至今还是个野蛮社会的根本原因。我在《凯迪》的博客中贴出前文，有位网友“子言 zp”跟帖评论道：

“我读过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对文明的本意，也有过一番常识性的思考，并认为文明被误读了。我认为文明应该是相对于野蛮的一个概念，野蛮的本质是指人类的暴力倾向，文明的本质是指人类的非暴力选择。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标准，应该是指非暴力选择涵盖的社会生活领域，涵盖面越大，则文明程度越高，否则就是文明程度低下。”

确乎如此，西方社会之所以比中国社会文明，正是因为人家具有充分的“非暴力选择”，不必如中国人一般，只有动用暴力手段，才能解决社会各阶层分赃不均引起的吵闹。咱们从鬼子那儿学来的物质主义并不是西方文明精华。精华恰在于咱们坚决拒绝的第一条公设，亦即“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造物，享受同等的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任何世俗力量都无权剥夺的。”

这就是人家社会的维稳软件。其具体操作是，用宪法的形式肯定公民同等的基本人权，以国会作为各阶级、阶层与集团分肥的谈判桌，在全社会实行“机会均等，费厄泼赖”，以司法系统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政府或私人的侵犯。当不同阶级、阶层与集团之间发生利害冲突时，除了在国会实行政策性“粗调节”外，弱势集团尚有议会外的合法抗争渠道与手段（如劳资谈判），作为解决冲突的“细调节”。这一系列巧妙的设计，使得“阶级斗争”能采用和平手段进行，不至于形成尖锐的社会矛盾，甚至积压为社会危机。

这就是民主制度的真正优越性所在，就是它有别于野蛮社会的最根本的特点。与浅薄的中国识字分子的想像相反，它造成的不是动乱，而是可以持续的稳定。它的优越性也不是浅薄的民主教徒们鼓吹的那样，主要不是道义上的而是功利上的。一言以蔽之：“和平化解社会矛盾，使得它们不至于积压下来形成危机，最后引出暴力革命或大规模动乱，就是民主制度的优势。”正因为此，在这些国家实行物质主义与享乐主义，并不会引出什么严重的社会危机来。

可惜中国识字分子却看不到这点，反而以为民主会引出动乱。这当然也是事实——“苏东波”的先例就摆在那里。如果今日中国骤然实行民主，引出来的动乱只怕要令南斯拉夫的“民主种族灭绝”瞠乎其后——光看看“民主斗士”胡安宁、安魂曲、方应看诸小丑对维吾尔族咬牙切齿、杀气腾腾的咒骂便可立即洞见这一点。但前文已经说过了，这不过是外来显性文明与本土隐性文明格格不入造成的。咱们不能因为自己忠实保留了北京猿人以拳头棍棒解决利害冲突的优良传统，就反过来贬低鬼子更文明的生活方式，甚至从猿人进化为疯子，阴暗心理大发作，认定西方人希望中国人过得更干净更体面些的善良愿望，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未死”。

更令人绝望的是，没有多少识字分子看出来，咱们现在这杂糅了东西方生活方式的新生活方式，比传统生活方式还糟糕，其实是集东西方糟粕于一身。

前文已经介绍过，传统文明的两大特点，一是将“人生而不平等”道德化、“天理化”，换用海外爱党写手“随便”先生的现代表述，便是“狼吃羊是宇宙运行规律”。第二个特点则是禁欲主义，以压制人欲、冻结社会物质进步的手段来维稳。这两个软件都非常有效，确实制造了高度稳定的社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两条价值观本身非但互不冲突，而且还起到了协同作用（也就是 1+1>2）：既然节欲是一种美德，当然穷人也会知足常乐，不会那么在意贫富悬殊了。

可惜这两个关键的价值观都被鬼子摧毁了：鬼子的“人生而平等”以及无神论的涌入，彻底摧毁了公开维持“狼羊律”的可能，而鬼子的物质主义与享乐主义，又使得千年古刹不得不改为妓院。在这两个损失之中，我还真说不上哪个更严重。

古人早就发现：“欲壑难填”，“人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欲望的满足只会是暂时的，越满足便越刺激出新的欲望来，而这“不知足”迟早要泛化到旁人头上去。如果相当大比例的公民被制度性剥夺了与其他公民同等的发财机会，则必然要造成社会矛盾。如果社会根本就没有和平化解这矛盾的机制，则必然形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若是统治集团挂羊头卖狗肉，说一套做一套，冒充“人民政府”，实际中却充当权贵们的护院家丁，则公民只会把一切道德说教视为欺骗手段，于是物质主义刺激出来的消费欲望便一定会失去道德约束，造成全民溃烂。大众心心念念的，只会是“早发财，快发财，发大财”，绝对不会考虑手段是否正当。逮得着算你的，逮不着算我的。一个只有法律威慑、没有道德伦理约束的社会，乃是天下最可怕的丛林。不幸的是，今日中国便是这种丛林。

马克思主义的要义，便是“唯生产力论”，认为生产力便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指标。用这个指标来衡量，中国社会确实是极大地进步了。可惜他忽略了“社会健康度”这个指标。我已经在旧作中给出了“社会健康度”的定义，简单来说便是社会内耗的倒数，或曰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上述民主社会和平化解不同阶级或集团的利害冲突，就是确保社会健康的重要设计，而另一个手段则是道德伦理加给公民的约束。咱们现在这两条都彻底没有了，连传统社会都不如，用民间俗话来说，便是“穷得只剩下钱了”。您说这到底算是进步，还是倒退？

五、如果中国全面引入了西方文明

如上所述，中国引入的西方文明，只限于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却将“人生而平等”的“普世价值观”坚决摒诸门外。高选择性地走资，便成了恶性走资，造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恶化了社会的健康，酿成了深重的社会危机。当然，这危机现下尚无发作模样，而是以“零存整取”的方式储蓄下来，悄悄地“做大做强”，待到日后经济成长停滞下来，或是遇到重大事件（例如朱成虎将军一类鹰派得势，中国在南海“亮剑”，与美国开战），再一笔地提取出来。

这黯淡前景，我已经在政治小说《当中国取代美国成了世界龙头老大——公元 2093 年大事记》中描写过了（国内读者可以翻墙到 hjclub.info 网站的《芦笛文集》中查看，也可在该网站下载 PDF 版的《芦笛全集》中的《汉奸国贼》，该小说就收在那个集子中。牛博的芦笛博客中也有）。

那小说记得是 2001 年写的。10 年过去了，我不胜惊骇地看着我那阴暗幻想越来越像谶语。朱成虎活脱脱就是小说中的总长傅经武，而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竟然连小说中的国家主席丁国雄的魄力都没有，是以坐视该“董卓”多次妄言国事，实行“枪指挥党”，不但在国际社会中蔚为奇观，而且完全打破了我党的传统——老毛老邓在世时，又有哪个丘八敢如此放肆？这奇观强烈提示，权威逐代递减的速率，似乎超过了我原来的估计。

由此可见，高选择性地引入西方价值观，在短时段内确能创造奇迹，但从长程来看，就连“大国撅起”梦都未必能圆。富国实际上现在已经基本做到了，但强国强兵就难矣乎哉了。哪怕中国在军备竞赛中全面压倒美国，跟人家动武也绝对是高效自杀术。那道理连小白都懂——老美没有咱们的内伤，从不像咱们的政府一样，把“稳定压倒一切”当成根本国策，整日价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一有风吹草动就惶惶不可终日。因此，人家再怎么打大仗，也绝不会如咱们那样，外患引发内乱，自家内部反起来，杀个伏尸亿万，血流漂舟，半个世纪都流不完。

那么，答案是不是该全面引入西方价值观，使得中国成为一个既富裕又健康、因而是真正强大的国家？

由上文可知，要这么做，先得改造咱们的隐性文明，否则移植物不是无法存活，便是被隐性文明改造得面目全非。咱们先不谈这个（实际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改造那烂污隐性文明，那起码得靠政府大规模动用强大的宣传机器为百姓洗脑，而且得从他们自己做起，这才能有起码的说服力，而这可能性可以排除。没有政府介入，即使政府不镇压封锁，光靠几个先知先觉嚷嚷，只怕也是杯水车薪），先作个“理想实验”：假定中国全面引入了西方文明，亦即回答我在本文引言中提到的第四第五两个问题。那俩问题其实有相当程度的重合。第五个问题的前两问，其实已经在前文回答了。因此可以合并为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落后国家全面引入了强大的先进的文明，取代了旧有的弱小落后的原生文明，那到底是福还是祸？“强大”是否就是“最适者”？美国生活方式能是中国的最适生活方式么？

关于这个问题，我本来想写篇寓言小说《处女国的永恒烦恼》讲一下。但写了半篇就扔下了，因为觉得此举太蠢——写得明白如话的政论许多读者都还看不懂，写成寓言就更没指望了。读那小说的人，一百个有一百个只会把它看成是搞笑色情小说（实际上确实搞笑，也很有点少儿不宜的烂话）。但做下面没有了的太监也不是回事，所以我干脆三言两语把那故事讲完得了。

却说东胜神洲有个处女国。该国只有女性，却也没有绝种之虞，盖该国人民长生不老，机体永远处在 20-30 岁的状态。国人连最起码的性观念性意识都没有。因为该国东南有大海，北部有沙漠，西部有无法穿越的高山，完全与世隔绝，所以该国人民因此以为处女国便是整个世界，成日价乐呵呵的，非常海皮。

不幸的是，一伙外来的冒险家乘船到了该岛，让处女们尝到了性事的快乐。可惜处女们虽然长的跟正常女人一样，却没有生殖能力，因此男人的数量很有限，供不应求。这宝

贵的性资源当然就被女王垄断起来，引起人民大众的强烈不满，成立了个“共夫党”发动革命，经过革命战争，最后终于实现了民主，按人头分配性资源。可惜那些男人不幸有若干死于争夺战中，待到战争停息，性资源就更紧缺了。粥少僧多，为了维护安定团结，国会通过法案，给剩下来的男人硬性规定了每日服务指标，实际上是为了社会稳定，不惜实行杀鸡取蛋政策，加速了男人们的衰老，而处女国的公民们又不会老，于是男人便一个接一个死去。日益萎缩的资源再度引起内战，最后因所有的男人都丧生而自动停息。从那以后，处女国的公民们便永远生活在无从消解的烦恼中，唯一海皮的是发了财的种黄瓜的菜农。可惜那海皮也是季节性的，一年也就那么个把月。

窃以为，中国就是那处女国，而鬼子就是那群坐三桅船来到处女国的冒险家们。他们带来的物质主义生活方式使得人民大众非常的海皮，可惜大家忘记了一点：男人是会被用完的，一旦用完以后，咱们就连黄瓜代用品都没有了（这就是比喻的蹩脚处）。人民在尝到富裕的滋味后，再倒回头去过穷日子，恐怕就很难了。那时社会还要讲团结安定，恐怕也就没有多少指望了。

这好像是杞人忧天，其实未必。西方之所以要搞物质主义，乃是因为市场需求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驱动力，为生产规模封了顶。为了发财，资本家必然要千方百计地鼓励刺激大众消费，使得社会成了消费定向，因此形成了物质主义的“历史潮流”，这潮流从美国蔓延到全世界去，其实未必是什么好事。

上文讲过，西方和平颠覆其他文明的价值观是两个，一个是“人生而平等”，另一个是“人欲即天理”。第一个不必说，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功利上都是正确的，是人类以非暴力方式解决利害冲突的前提，换言之，它就是文明的柱石。第二个就颇有问题了，盖它引入了两个假定：第一，富裕即使不是幸福的全部内容，也是必需的幸福要素。第二，物质享受是无限的，因为资源无限。如果第一个假定不成立，则富裕也未必能使人满意，推论便是买静求安未必是寻求社会稳定的良策。若第二个假定不成立，则资源用完或紧缺之时，人类的幸福感也就终结了。

不幸的是，这两个假定都经不起推敲。

先看第一个。国人现在的富裕程度，绝非 80 年代以前可比，您说现在的人烦恼是比那阵少了些呢，还是多了些？人类海皮感并非单元函数，影响因素绝不止富裕一个，至少包括安全感、物质欲望的满足程度与周围人事关系的和谐度。

安全感是由“风险的可预期性”决定的，而这可预期性又由社会运作方式决定。在西方常态社会与在中国那种病态社会中生活的区别，犹如在西方与在中国开车的区别。前者什么都是按“明规则”来，你可以准确预期社会对自己的行为作出的反应，正如开车时你可以准确期待别人的反应一般，而在中国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在中国从来不敢开车，哪怕是坐出租也时时让我肾上腺几乎耗竭，下车时常常脚瘫手软，最后觉得还不如去坐公车。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沿途充满了无穷无尽的 nasty surprises，让你反复吓得冷汗出了一身又一身。我不知道日常生活是否也充满这种惊险，想来不至于吧。毕竟，虽然没有西式明规则，毕竟有个潜规则，比根本没有规则好歹强得多。国人普遍缺乏安全感，可能还是因为道德全面崩溃，本能地觉得这种世道不会长久。而低收入的工薪阶层缺乏安全感，则是因为医老虎吃人不吐骨头，平时没事，一旦病倒，马上就是灾难。

物质欲望的满足度，就是“与过去比”和“与旁人比”产生的感觉，后者更重要。毛时代的人穷得要死，但那时许多人都很海皮，就是因为没有比较的参照物：高官的奢华咱们看不见，能看见的都是一伙叮当响的穷棒子，能有什么引动不平的？而且，非消费定向的贫穷社会的人的欲望都很简单，轻易即可满足。消费定向的富裕社会可就不同了，生产的驱动力就是千方百计地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望，由专业队伍挖空心思去发明出各种各样新奇的欲望满足方式来，再使用强大的广告手段引诱大众去尝试。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会小富即安，钱再多也不会餍足，与旁人攀比更容易刺激出不平心态。

人事关系的和谐度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社会的竞争方式。如果是比赛创造力的良性竞争，那失败者一般输得心服口服，不至于衔恨在心。如果是比赛巴结人、收买人、控制人、坑害人能力的恶性竞争，则一定后患无穷。第二，社会的缔结方式。东方式拥挤社会人都挤在一起，关系千丝万缕，是非与矛盾要比西方的疏远社会多得多。第三，周围的人的道德水平。若是大家都充满善意和礼貌，一团和气，则人事关系当然融洽。若是大家充满嫉妒心，如乌眼鸡一般，一个个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则那当然无和谐可言。

由以上论述可知，富裕并非决定幸福感的唯一要素。若中国处在现状，它就更未必可靠了。当然，我们的假定是中国全面采用了美国生活方式，包括全民接受了人家的隐性文化，公民的安全感与人事关系和谐度相当于美国。在这种假想情况下，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似乎也就等于欲望的满足度了。不幸的是，上面已经说过，富裕未必满足，满足者也未必富裕。全社会追求富裕，未必能给公民带来幸福。

再看第二个假定，似乎不用说，资源不是无限的，因此人类的物质享受也不会是无限的。连美国那种真正地大物博的国家都迟早要用完资源，何况中国那种人口超级大国、资源小国？我出国 20 多年来，油价翻了几番。若是中国将美国路走到底，到最后全国人民有一半有了车，也就是六七亿部小车，光那油耗恐怕就要耗竭本土的资源。其他资源也是这样。如果最后资源用完了，被消费定向经济千方百计刺激起来的人欲得不到餍足，势必跟吸毒者戒毒一般，折腾得惊天动地。

由此可见，中国的传统生活方式也不是一无是处。提倡知足常乐，淡泊自甘，强调社会成员之间以礼相处，以德自律，确实是一个生产落后、资源稀缺、人口众多的拥挤社会的最适生活方式。咱们的悲哀，乃是无法闭关自守，而被迫“与国际接轨”。等到处女国的公民们尝过被美国物质主义诱奸的滋味后，就再不可能回到往昔的简朴生活方式去了。明知美国生活方式难乎为继，政府也不得不在那条路上走下去，把漏船划到沉没那天。Meanwhile，官家还要坚决拒绝人家那第一条“普世价值观”，从而取消了用完资源后全民乖乖勒紧腰带、心甘情愿地回去“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可能。

这结论就是，美国奉行的物质主义生活方式，不可能是中国的最适生活方式，然而其强大的诱惑力，使得政府明知（或不知，待考）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击鼓传花，尽可能把那炸弹扔到下一任手中去。为了确保炸弹不在我手中爆炸，我便不惜杀鸡取蛋，能买静求安一时都是好的。

六、我的乌托邦梦

前文在《芦笛在凯迪》贴出后，我收到一位青年网友的来信。他说，出于感情原因，他无法认可我的全部观点，尤其无法接受“在美学与功利的意义上，华夏文明相当于西方文明都是一种劣等文明”之说。作为一个在那块土地上出生长大的人，纵然我那话是事实，他也无法坦然接受。我本人也在中国生活了好些年，应该能体会这种痛苦的撕裂感，云云。

我当然能体会，我在那块土地上度过了将近四十年，比这位青年朋友的年龄多出了几乎一倍去。正是因为这种无法忍受的撕裂感，我才完全丧失了回国的意愿，免得珍藏在记忆深处的梦幻中国被现实中国的狰狞形象彻底取代。王开岭先生的博文《每个故乡都在消逝》就述说了我的痛苦：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245/24525.html

惟其如此，我才无法理解我那文章的震撼感与刺激感是从哪儿来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人的文化自豪感与文化认同感，到底是附着在什么东西上？为什么他们无法接受“皇帝的龙体一丝不挂，华夏文化已经荡然无存”的简单事实陈述，却能坐视在神州大地上全面展开的轰轰烈烈的文化灭绝战争？为何没人明白，那些被无情拆毁的民居，就是他们无比珍爱、无比自豪的华夏文化？

王开岭先生那博文已经讲了，今日中国是一个没有故乡、没有昨天、没有记忆的国家。他没说的是，方今之世，“文化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在“地理中国”中，你只能看见一千个一模一样的美式水泥森林，唯一的区别只在于规模的大小，既找不到任何中国特色，更看不到任何地方风情。没有一个城市或村镇还保留着自己的个性，大到城市，小到街道，全都是 identical 的标准件。所有的大小地名都已蜕变为没有生命、没有灵魂的抽象符号，将它们互换绝不会造成什么错位感。正当印着 Made in China 字样的商品如潮水般席卷全世界之时，China 本身却再也无处寻觅了。这种伤心惨目的撕裂感，让人终于明白了顾炎武说的“亡天下”是什么意思。

奇怪的是国人对这种史无前例的文化灭绝战争非但安之若素，而且竟有一种自豪感。90年代末我回去，亲人们特地领着我前去瞻仰那些顶天立地的玻璃钢怪物，无限自豪地跟我说：“有点现代化的模样了，诶？”连我家的人都如此，何况他人？似乎没人意识到这正在狂热进行的文化灭绝、传统灭绝、历史灭绝的“三光”人民战争，实际上反映的是人民大众对“土”（传统文化）的极度鄙夷，对“洋”（以摩天楼、高速公路为象征的肤浅美国文化）的无限歆羡。

就连某些海外华人也认为这是应该的。上次我写《何必埋骨中国》，贴出传教士们建的北京协和医院与成都华西协和大学的照片，说鬼子反而比中国人自己更知道心疼爱护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真是咄咄怪事。某位“台（毛）共中宣部长”唐好色先生因教育我，要尊重中国的国情，中国人太多，就是应该这么干，云云。

他教育我的这些革命道理，我早在官方媒体（也就是“媒婆的身体”，我坚定认为 media 就是这个意思，而“博士后”就是“博士的皇后”之意。谁敢不同意，我跟他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上看熟了：中国的人权就是生存权，实在不必由他重复灌输。我所不解者乃是，如果一个民族不拿自己的文化当回事，认为为了多住那么几平方，就该无情铲除先人留下的一切痕迹，那这个民族还有什么脸去冒充爱国者，斥骂不赞成这种行为的人是汉奸？更何况我实在不知道，那些被无情拆毁的街道，有多少是为了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忍痛作出的牺牲，又有多少是暴发户石崇为了显阔、无情打碎的王恺家的三尺高的珊瑚树。起码那惨不忍睹的“大裤衩”与民生毫不相干吧？

这位青年朋友最后说，他希望我能给出危机的解决之道，说出华夏文化该何去何从，纵然是一家之言，他也愿意倾听。有的《凯迪》网友在我那博文后的跟帖似乎也表示了这意思。

我认为，这世上有许多过程是不可逆的，死亡就是一个不可逆过程。华夏文化作为显性文明，已被彻底摧毁，哪里还有什么复活乃至复兴的可能？君不见上次奥运开幕式，咱们什么国货都拿不出手来，只好去反复死吹老祖宗的四大发明？莫非当代华夏文化竟然是一种古墓文化？要么是古埃及那种业已灭绝、连后裔都找不着的文化幽灵？又如上次国庆大阅兵，无论是武器，是服装，是“洋操”，又有哪一个细节能告诉你那是咱们发明的？

说到底，咱们的世纪梦，不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有的，东方无产阶级照样有”么？可笑亦复可悲的是，大众竟然没意识到那是一种文化自卑感的表现，而正是在这种自卑心理的驱使下，国人才万众一心、群策群力地去奋勇铲除华夏文化留下的一切残迹，却丝毫没有意识到，东方有而西方无的文化景观，才是值得百倍珍惜心疼的。如果每个城市都变成了曼哈顿的拙劣拷贝，咱们也就把“中国”从地图上抹掉了，到时可以拿出来证明中国尚在世间的证据，除了中国特有的文盲骗子于丹、蒋庆与东海一枭之流外，便只有出土文物了。

这当然不是主张保留中国的腐恶烂污生活方式，以此傲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文化落后国家，中国必须西化，这是所谓“世界潮流”，无法抵挡，原因我已经在前文反复说过了：鬼子的所谓“物质文明”对国人的诱惑力大到无从抗拒。但国人必须认识到，咱们只能引入人家的精华，不能把糟粕也弄进来。即使是中性的东西例如物质主义，也得根据中国的国情量力而行，否则后患无穷。

现在的问题是，咱们完全弄倒了，取其糟粕，弃其精华，将鬼子的人道主义、人权观等等视为蛇蝎，却把人家的 3P、换妻、肛交、海洛因、马杀鸡当成宝贝，更杀鸡取蛋、竭泽而渔，为了追求人家奢华的生活方式，不但贱卖自家资源，而且无情扫荡一切传统城市文化景观，最后的结果造出了一个“N 无世界”：社会无维稳软件，城市无个性，人民无道德，无灵魂，无文化内涵。对外来的强劲文化冲击，这实在是一种极度糟糕的应对方式。

那么，应该怎么办？我的感觉是，文化中国的沉没虽然是悲剧，但毕竟已经发生，无法挽回了，当务之急是停止自欺欺人，造出个维稳软件来，这才是重中之重。朝廷必须看到，毛左才是他们的死敌，对现政权构成了最致命的威胁，而当局因为至今还在打着毛的旗号，又无法公开镇压，因此只能软性化解，以逐步引入“普世价值观”来消弭社会危机，从而釜底抽薪，拆毁毛式杀富济贫的暴力革命再度发生的温床，用英文来说就是

pre-emption——社会危机化解了，“造反有理”的毛泽东思想也就在草根民众中自然失去了号召力。

这不是说要立即引入西方民主制度，那样只会如南斯拉夫一般，引出“民主种族灭绝”来，而是实行开明专制，以回归前的香港为效法榜样，将公民权利逐步归还给他们，并严格实行法治，即使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以司法系统保护公民正当权益不受侵犯，起码要使得他们有依法捍卫自己的权益的可能。当局必须认识到，一个社会如果只留给公民“要么俯首帖耳忍气吞声听任宰割，要么揭竿而起”的两种选择，那这种社会连山顶洞人的社会都不如。在这种野蛮社会中，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将永远不会失去强大的感召力，而当局就永远有被毛式暴力革命推翻的危险。

令人欣慰的是，近来当局在这方面有了很大进步，没有铁腕镇压本田和其他工厂的罢工就是个好的开端。我记得萧功秦教授对这类问题提过极好的建议。可惜我找不到那篇文章了，现在又害了老年性痴呆，连大意都无法准确转述，那意思好像是中国不宜学习西方那种靠工会与厂主对抗性斗争来解决劳资冲突，而应该学习国民党的经验，赋予现有工会以一定的独立性，让它们参与劳资谈判，真心诚意地为工人争利益，由此逐渐转化为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组织，从根本上杜绝富士康 12 跳那种惨剧发生。

此外还要改造那烂污腐恶的隐性文明，重建社会道德。在这方面，孔孟的文化遗产可供借鉴继承。

前文已经解释过，孔教之所以变成了伪善之道，原因在于孔子那原始人的思维太粗疏，对真实的人性毫无了解，因而在“君君”与“臣臣”中实际上使用了双重标准。在理论上，两者都靠自律来实现。但在实践中，“君不君”屁事没有，而“臣不臣”就要掉脑袋。因此，“君君”只可能是大众一厢情愿指望明君大发慈悲去自律，而“臣臣”则由暴力的“他律”来保证。“父子”、“夫妻”、“尊卑”的上下级关系也类此。官府无情镇压的对象，从来是以下抗上的下等人。孟子虽然朦胧地察觉了原教旨的这一缺陷，转而反复强调“君君”，但他也没能想出个具体的可操作的政治技术来实现这一目标。这当然是时代局限使然，丝毫无损于老孟的伟大。

但如今这政治技术就不需要国人去发明了，引入鬼子那套以民众“他律”政府的手段去“君君”，从理论上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咱们既然要复兴传统中国文化，fine，那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鬼子的手段去实现亚圣的伟大政治理想，实行真正的“德治”，在中国首次搭起“道德等级制”来：从最高领导到最低档的公务员，每个级别都实行不同程度的道德要求，最高领导必须是全民的道德楷模，跟圣人一般无二，次级领导则必须是“亚圣”，第三级领导则必须是“季圣”，如此逐级递减。各级领导是否达到了该级别必备的道德要求，则由独立媒体（＝媒婆的身体）实行全面监控，及时通知公众各级领导的收支财务状况，是否有滥用职权行贿受贿贪污包 N 奶等情事，由公众每年评估，罢免操守有亏的官员，违法官员则由独立的司法系统惩治。老百姓的道德改善则靠各级领导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去感化。对于那些制造坑人害人的伪劣假冒产品的不法业主，则应立法严惩，务必要把实行“赏恶罚善”逆向淘汰的烂污环境，扭转为“赏善罚恶”的健康环境。

此外还要在宪法总纲里写入亚圣历万世而不朽的光辉教导：“民为重，国家次之，政府为

轻”，“政府之视民如土芥，则民视政府如寇仇”，并将这些伟大教导写入教科书，动用官方媒体（＝媒婆的身体）广为宣传，使之深入人心，连文盲都能琅琅背诵，以对现任官员乃至未来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起到“他律”的震慑作用。

这才是真正的德治，才是孟子始终未能实现的伟大理想，才是重建社会道德的先决条件。舍此不由，当官的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还要冒充教士去教化众生，指望“六亿神州尽舜尧”，那也未免太轻侮百姓的智力了。前文已经说过，因为外来文明的冲击，“上诈而下愚”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现在是上下俱诈，而这种恐怖社会中蕴藏着的巨大爆炸风险，自不必待智者始能察之。

如果中国能做到上面说的那几条，则社会也就建立了真正的维稳软件，一劳永逸地消除了暴力革命的可能，那也就再不必靠贱卖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来买静求安了。当社会真正实现了和谐之后，即使资源紧缺迫使国人再过紧日子，那也不难恢复传统社会知足常乐、淡泊自甘的生活方式，不至于因此触发社会危机，引出大乱来。

可惜我也知道，以上所说不过是一场春梦。此无他，“不见棺材不掉泪”乃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标准行为方式，写在廿四史的每一页上，从来是中国的优良传统，牢不可破，历久弥坚。

（全文完）